

## 【历史研究】

# 画像及铭文所见汉代“利后”思想探析\*

张书增 高二旺

**摘要:**“利后”即对后代有利,这种思想在汉代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画像砖、画像石、铜镜、瓦当、带钩、丝织品等各种物品上的吉语铭文都是其生动体现。利后思想不仅是美好愿望的体现,更是汉代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汉代“利后”思想的出现,与汉代社会家庭结构、灵魂信仰、入仕制度、商业发展等密不可分。为了对后人有利,汉代人通过祭祀、修建墓冢、辟邪、谨言慎行等行为来达到目的。汉代倡导的以孝治国的主导价值观与流行于民间的“利后”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国家制度和民间习俗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偏差。

**关键词:** 汉代;“利后”思想;铭文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2)12-0136-05

所谓“利后”,就是希望对子孙后代有利。学界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宜子孙”<sup>[1]</sup>和器物中吉祥用语的研究<sup>[2]</sup>。“利后”思想与“宜子孙”意识虽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需要进一步探讨。“利后”不仅仅是一种吉祥用语,更是汉代人行事所遵循的重要理念。正史中关于汉代“利后”思想的文献记载较少,但一些画像砖石、铜镜等物品上的铭文及图像中,“利后”思想却表现得非常普遍。通过总结汉代“利后”思想的外部表现形式,分析其存在的社会背景,进而探究其对封建社会民众生活的影响,对于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和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一、汉代“利后”思想在画像砖石与器物铭文中的体现

### 1. 汉代“利后”思想在画像砖石中的体现

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有不少与“利后”思想相关的铭文。如四川西昌市南坛乡出土的画像砖中,

有的上部刻菱形纹,下部刻“利后”二字,也有的上部刻菱形纹,下部刻“王侯”二字<sup>[3]</sup><sup>140</sup>。这些文字表达着先人希望后代子嗣能够获封王侯的美好愿望。同时,四川的画像砖中也有“延年益寿利后子孙吉”“宜子孙长大吉利”“后人长乐”“宜子孙富贵昌利后世寿命长”“宜子富贵”“后人千万”“大利子孙”等铭文<sup>[3]</sup><sup>140</sup>。比如,在四川三台县出土有“子孙高千”的铭文画像砖,成都武侯区出土有“永兴元年刘鱼造宜子孙”铭文砖<sup>[4]</sup>。四川的画像砖除了有类似“利后”的铭文外,还有其他蕴含吉祥之意的砖铭文,如二十四字砖,其铭文曰:“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兄弟。长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sup>[3]</sup><sup>67</sup>

在全国许多地方的画像砖中,刻有“利后”铭文的有很多,如林格尔汉墓出土的铺地砖上,刻有“子孙繁昌,富乐未央”<sup>[5]</sup>的铭文。三峡库区的东汉墓砖上也发现有“吉”“利”“富”“贵”“富贵”“富贵昌乐未央”“千万”“大吉昌”<sup>[6]</sup>的吉祥铭文。这些祝福的文字大多是针对死者后人的,反映了他们对后

收稿日期:2022-09-15

\*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汉画中的礼文化研究”(2022-JCZD-16)。

作者简介:张书增,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38)。

高二旺,男,南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汉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河南南阳 473061)。

代美好幸福生活的希冀。河南漯河也出土了数块利后类铭文砖,如“延寿富贵宜子孙”“宜子孙宜田宅”<sup>[7]</sup>。云南昭通段家梁子砖室墓出土的砖铭记载有“八千万侯”文字,贵州安顺出土的砖亦有“宜子孙”铭文<sup>[8]</sup>。

不仅在画像砖中,在画像石、瓦当中也有表达“利后”思想的铭文,如陕西米脂县官庄出土的画像石中,画像中栏隶体阳刻“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千万岁室长利子孙”<sup>[9]</sup>。陕西汉代的瓦当中,有“大富”铭文,一些空心砖也有“日制千万”“长乐未央”“甲天下”“常生无极”等铭文<sup>[10]</sup>。

## 2. 汉代“利后”思想在器物铭文中的体现

除了画像砖石铭文,汉代日常器物上也有不少类似的文字。如一些洗的底部,有“君宜子孙”“长宜子孙”“宜子孙”<sup>[11]</sup><sup>144</sup>等字样。汉代一个博山炉上,刻有“天兴子孙,富贵昌宜”<sup>[11]</sup><sup>157</sup>的铭文。汉代的带钩上刻绘“长宜子孙”<sup>[11]</sup><sup>165</sup>的字样。汉代的铎上,也刻有“宜子孙”“大吉利”“宜田原”等表达“利后”思想的铭文<sup>[11]</sup><sup>166</sup>。汉代铜镜铭文中关于祈祷高官、子孙昌盛、长生不死的铭文更是比比皆是,尤其以“长宜子孙”最多,还有“长宜高官”“君宜高官”“长生宜子”四字铭文。这反映了当时人们追求富贵、多子、长寿的思想观念<sup>[12]</sup><sup>293</sup>。

汉代的丝织品上也有类似铭文。新疆尼雅95MNI号墓地M8墓地断代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墓中发现男尸所穿长袍和裤腿均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上衣还有“宜子孙”锦,女尸头枕“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sup>[13]</sup>。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木牍上载“二幅细地宜子孙被”<sup>[14]</sup>。这说明“宜子孙”的字样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被广泛用于制作生活用品的装饰,而这些铭文均明确表达了“利后”思想。

汉代的玉饰品中也有“利后”思想的文字。如青州市马冢子东汉墓出土的两块有铭文的玉璧中,其中有一块铭文为“宜子孙”<sup>[15]</sup>。2009年,安徽省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个透雕“长宜子孙”双龙璜形玉佩。经考古人员推断,推知墓主为东汉时期的阜陵质王刘延<sup>[16]</sup>。这表明“利后”思想在贵族阶层也普遍存在。东汉灵帝时的张迁碑中,也有“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的表述<sup>[17]</sup>。汉代的简牍、帛书、印章等多种器物载体上都有“宜子孙”之类的铭文。总

的说来,铭文背后蕴含着人们希望子孙后人富贵、快乐、长寿、昌盛等具体愿望,或者笼统概括为希望子孙吉利。王子今先生认为,“宜子孙”是秦汉人普遍的社会愿望<sup>[1]</sup>,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利后”思想不仅仅表现在“宜子孙”的愿望上,也表现在汉代人为了有利于后代而所作的种种努力上。

## 二、汉代“利后”思想流行的社会土壤

“利后”思想虽然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其最流行的时期是汉代。西汉任宏对成帝的进言中提到:“陛下圣德宽仁,敬承祖宗,奉顺神祇,宜蒙福祐子孙千亿之报。”师古曰:“《大雅·假乐》之诗曰‘干禄百福,子孙千亿’。”<sup>[18]</sup><sup>333</sup>这里的“千亿”是子孙繁多之意,而画像砖中的“子孙千万”也同为此意。汉代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利后”思想为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并成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念。

### 1. 汉代的家庭结构是“利后”思想的社会基础

汉代,核心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尽管也有大家族的存在,但人们更看重核心家庭,更重视自己的后代,希望自己的家人生活幸福。汉代的家庭结构里,以夫、妻、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占据相当比重。核心家庭通常由两代或三代人组成,即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主干家庭,或由父母、一对已婚子女及其子女组成主干家庭<sup>[19]</sup>。这种情况下,人们关心自己的核心家庭甚于关心自己的家族,而子孙则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汉代成书的《仪礼》中,有父亲为长子服三年丧的礼制要求。《仪礼·丧服传》谈到这个问题时解释道:“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sup>[20]</sup>之后,逐渐由对长子的重视延伸到对子女的慈爱。如陕西米脂县崔家湾贺家沟砖窑梁出土的画像石中,下格正中置一博山炉,炉左右各立一妇人,左一小孩坐立于妇人前,伸手拨弄妇人的袍襟。右一小孩坐于地上,手举枝条,似在玩耍<sup>[9]</sup><sup>76</sup>。陕西画像石中还有多处关于慈爱儿童的画面,如米脂县博物馆收藏的一块右门柱画像石,有两格都刻画着妇女带小孩的画面<sup>[9]</sup><sup>228</sup>。画像石中对儿童的刻画,显示出了汉代人对后代子孙昌盛的愿望。

### 2. 汉代的灵魂信仰是“利后”思想的文化基础

“利后”思想的盛行依赖于特定的文化基础,而汉代对灵魂的信仰与崇拜为此提供了契机。汉代人

认为,人去世后灵魂依然存在,并能够对生者产生有利或有害的影响。汉代画像石和部分随葬器物是墓葬主人的后代所制,祭祀者正是自己的后人。人们希望先人去世后能够保佑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长寿、富贵、兴旺。四川画像砖中,砖铭文常有“恭作此冢吉后”<sup>[3]</sup><sup>161</sup>的字样。四川长宁“七个洞”熹平元年(172年)崖墓题记也明言“作此冢宜子孙”<sup>[21]</sup>,希望死者灵魂能够保佑后人。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也有“作冢常富贵”“千秋万岁”“大富昌乐未央”“永初七年作冢长富贵”<sup>[22]</sup>的铭文。这些铭文均明确提出“作冢”能够为后人带来富贵长寿。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151年)画像石墓题记表述得更加具体,“魂灵有知,怜哀子孙,治生兴政,寿皆万年”<sup>[23]</sup><sup>126</sup>。这些祝福的文字其实是汉代人对自身幸福生活的向往,希望死者能够为后代带来富贵,而祖先的灵魂则是子孙的保护神。咸阳教育学院出土东汉永平三年(60年)的朱书陶瓶有“除央去咎,利后子孙,令死人无适,生人无患”<sup>[24]</sup>的铭文。尽管汉代人普遍认为死者去世后灵魂存在,但对灵魂却有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希望死者的灵魂保佑后代;另一方面认为生死异路,希望死者的灵魂不要为祟,伤害后代<sup>[25]</sup>。不管哪种态度,都是为子孙后代考虑,为了有利于后代。

### 3. 汉代的入仕制度是“利后”思想的现实基础

“利后”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希望后代富贵通达,获封“王侯”是对后世贵显的希望。汉代采取军功授爵的方式,普通人通过战功是有可能获得封侯的。如李广的部下“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sup>[18]</sup><sup>2446</sup>。汉武帝还因言选人,一批出身普通的布衣学子因勇于进言而轻取富贵,“孝(文)[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炫鬻者不可胜数”<sup>[18]</sup><sup>2918</sup>。

汉代重视儒学,通过读书通经,同样能够入仕并获得高位。如西汉朱买臣家贫,靠卖柴为生,但他爱好读书,并对妻子说:“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sup>[18]</sup><sup>2791</sup>后被武帝赏识,从此入仕贵显。前述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题记中还有“学者高迁宜印绶,治生日进钱万倍”<sup>[23]</sup><sup>127</sup>的内容。汉代画像石中有不少印绶的刻画,多是表达希望后人从政高迁的意愿。总的来说,汉代人因读书入仕,获取高官之位的情况非常普

遍<sup>[26]</sup>。因此,汉代通过军功、读书增才、德行突出,平民都有机会入仕做官,达到贵显的目的。人们希望子孙后代富贵、快乐、繁昌,而这些目标是可以通

### 4. 汉代的商业发展是“利后”思想的经济基础

西汉时期,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晁错感叹:“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sup>[18]</sup><sup>1133</sup>西汉的张禹就是通过经商致富的,“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sup>[18]</sup><sup>3349</sup>。东汉时期,很多人因经商而富有。如东汉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吴汉“以贩马自业”。商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整个社会以富贵为荣。而无论自己是否富贵,人们均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富贵、长寿、快乐、人丁兴旺。

为了迎合社会的这种主流价值,商品的生产者也有意在器物上刻上“利后”相关的铭文和图案,以使商品更加畅销,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东汉乐浪王盱墓出土的一件漆盘,铭文云:“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纆,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sup>[27]</sup>铜镜上铭刻的吉祥文字是为便于销售而做。如一块延熹九年(166年)的兽钮铜镜铭文即有“买者长命宜子孙”<sup>[28]</sup>字样。南阳市博物馆藏延熹十年圆钮铜镜上隶书铭文:“位至三公,长乐未央,子孙千人出南阳兮。”<sup>[29]</sup>东汉中期以后,纪年、纪氏、纪地铭辞及宣传铜镜的铭辞如“君宜高官”“长宜子孙”“位至三公”镜铭也十分流行<sup>[12]</sup><sup>293</sup>。可以看出,汉代铜镜上的“利后”刻绘铭文与汉代商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不仅铜镜,汉代的刀剑上也有类似的铭文,如“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卅涑大刀吉羊宜子孙”<sup>[30]</sup>。上文所提到的带有“利后”铭文的丝织品、玉璧、带钩、博山炉等器物,许多也是作为商品出现的。

## 三、“利后”行为的实践方式与影响

### 1. “利后”行为的实践方式

为了达到“利后”的目的,汉代人不仅通过修建墓冢、妥善安葬死者来保佑后代,还通过祭祀、辟邪、谨言慎行等方式来达到目的。

一是祭祀。汉代人认为,通过祭祀等活动,能够

起到保佑后人的作用。西汉宣帝时,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后,暴至巨富”<sup>[31]1133</sup>,至东汉阴识,三世而遂繁昌。不仅普通人家如此,皇室也是这样。成帝久无继嗣时,皇太后在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她认为是祭祀的缘故,因为汉武帝时期“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故能“飨国长久,子孙蕃滋”<sup>[18]1259</sup>,所以她主张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祭祀。

二是修建墓冢。汉代人认为,墓地选择适宜,会对后人有利。因此,东汉的风水选墓思想盛行。《太平经》中的《葬宅诀》提到,通过选墓,可以达到“利后子孙,万世相传”<sup>[32]</sup>的目的。东汉袁安父亲去世后,“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提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sup>[31]1522</sup>。可见,在汉代人看来,为先人选择适宜的墓地会直接影响子孙后代能否昌盛。

三是辟邪。汉代人认为,辟邪不仅能够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同时也是一种对后代发展有利的方法。他们相信祖先灵魂能够保持不灭,可以持续保佑子孙后代免受厄运和灾难的侵袭。腊八节使用苇茭辟邪的习俗就是最好的佐证。东汉应劭解释说:“故用苇者,欲人子孙蕃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交易,阴阳代兴也。”<sup>[33]</sup>用苇茭来辟邪的主要目的是使子孙昌盛。

四是谨言慎行。谨言慎行是人们通过约束自身的言语和行动,既不发表有悖于法律、伦理、宗教的不当言论,也不做出有危害国家统治的违法行为。汉代人认为,谨言慎行能够起到趋吉避凶的作用,否则一旦不小心触犯相关法律,容易招致“满门抄斩”和“诛九族”等对后代不利的严重后果。西汉末年,李寻劝大司马刘根隐退避祸,“诚必行之,凶灾销灭,子孙之福不旋日而至”<sup>[18]3182</sup>。通过自身的谨言慎行造福后代,是汉代人行为处事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 2. 汉代的“利后”思想与国家治理

汉代人基于对后代的关心而产生的种种“利后”行为,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追求,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国家统治与社会发展。汉代“利后”思想与统治者以孝治国的理念既对立又统一。汉代实行以孝

治国的基本方略,子女孝养父母是被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尽管儒家提倡父慈子孝,但子女对父母只有单方面的道德义务,父母对待子女却并没有被国家重视,甚至父亲可以随意处置子女。如金日磾发现自己的长子“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sup>[18]2960</sup>,便把儿子杀死,获得了汉武帝的敬重。汉代甚至还出现了“郭巨埋儿”的故事,说明对父母尽孝是为人子嗣的首要任务,杀死自己的儿子不仅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甚至被人们视为“孝子”与“忠臣”。

父母对子女虽然没有任何法定义务,但父母对后代子孙的关心则是人之常情。南阳东关许阿瞿画像石铭文表达了父母对儿子夭折的痛苦心情:“永与家绝,岂复望颜。”<sup>[34]</sup>这种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在正史当中很少被描述,但这恰恰反映了民间的真实情况。“利后”类铭文的出现,则把父母对后世的期望直接表达出来。在肩水金关汉简中,有一木牍上书“视长孙病”<sup>[35]</sup>的字样,应该是祖父看望生病的长孙,作为通关时的凭证。相反,如果后人生活不幸或子嗣断绝,则被认为是一种灾祸。如吕后杀韩信,夷其三族,班固认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sup>[36]</sup>后世不断绝,祖先受到后人的不断祭祀,是理想的状况,大到皇室贵族,小到平民百姓,都是如此。因此,“利后”思想与孝道观念在子孙繁昌这方面是统一的。至于希望后人幸福、看重后代的“情”,又同孝敬长辈这种“义”产生了错位,表明汉代倡导的以孝治国的主导价值观与流行于民间的“利后”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国家制度和民间习俗二者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 结 语

汉代“利后”思想不仅出现在画像砖石铭文中,也出现在洗、铎、博山炉、带钩、印章等日常生活用具上。汉代“利后”相关铭文的载体大多为画像砖和实用物品、随葬品等小件物品。正是由于画像砖和小件物品价格低廉,因此能够为普通百姓所拥有。这表明了“利后”思想在汉代确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除了直白的希望后代子孙吉利的铭文表达外,还有一些画像图案也含蓄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如鱼的图案代表富裕,羊的图案代表吉祥,龙虎能带来财利,鸟雀和猿猴谐音爵位和封侯,代表富

贵。“利后”思想不仅是汉代人价值观念的体现,反映了汉代人追求幸福的渴望,同时也是汉代人行为处事所遵循的原则。这种思想在汉代以后持续流行,直到今日仍然是百姓追求幸福的主要方向,这也显示出汉代是中国人核心精神形成的关键时期。

####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秦汉社会的“宜子孙”意识[J].秦汉研究,2007(1):18-36.  
[2] 周克林.东汉“五利后”铭文解考辨[J].求索,2010(2):214-216.  
[3] 高文.中国巴蜀新发现画像砖[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6.  
[4] 高文.汉代瑰宝:记四川出土的汉代纪年砖字砖[J].中国书法,2004(9):35-42.  
[5]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  
[6] 马雨林.三峡库区的东汉砖室墓和墓砖[J].文博,2014(1):23-27.  
[7] 衣雪峰.若希斋藏文字砖述略[J].东方艺术,2010(20):111-134.  
[8] 张晓超,赵俊杰.云贵高原出土汉晋时期砖铭的考古学观察[J].考古学集刊,2021(24):168-187.  
[9] 康兰英,朱青生.汉画总录 1:米脂[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8.  
[10] 张鸿修.陕西汉画[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11] 冯云鹏,冯云鹤.金石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2] 黄爱民.故宫藏《小松集拓铭铭》述考[J].故宫学刊,2020(1):281-293.  
[13] 于志勇.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 95MNI 号墓地 M8 发掘简报[J].文物,2000(1):4-40.  
[14] 管理,杨军.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J].文物,2018(11):87-96.  
[15] 姜建成,刘华国.山东青州市马家冢子东汉墓的清理[J].考古,

2007(6):59-75.  
[16] 许建强,邱雪峰.安徽寿县寿春镇计生服务站东汉墓遗物及相关问题[J].东南文化,2014(3):46-52.  
[17] 房弘毅,卜希旸.复原高清图法书选:汉张迁碑[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3:76-77.  
[1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9] 岳庆平.汉代家庭与家族[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11-17.  
[20] 郑玄,贾公彦.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884-885.  
[21] 罗二虎.长宁七个洞崖墓群汉画像研究[J].考古学报,2005(3):280-282.  
[22]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M].文物出版社,1990.  
[23] 张其海.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J].考古,1975(2):126-127.  
[24] 刘卫鹏.陕西咸阳毕塬路东汉墓出土宋氏朱书陶瓶[J].文物,2019(3):87-91.  
[25] 高二旺.论汉代人对灵魂的认识和干预[J].中州学刊,2015(7):112-122.  
[26] 鲁丽.汉代的读书和入仕[J].南都学坛,2017(4):15-18.  
[27] 孙机.关于汉代漆器的几个问题[J].文物,2004(12):53.  
[28] 刘永明.汉唐纪年镜图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8.  
[29] 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出土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07.  
[30] 钟少昇.汉式铁剑综论[J].考古学报,1998(1):49.  
[3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2] 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183.  
[33]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368.  
[34]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画像石全集 6:河南画像石[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70.  
[35]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肩水金关汉简:(叁)[M].上海:中西书局,2013:214.  
[3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30.

## An Analysis of the Thought of “Benefiting the Offspring” in Han Dynasty Seen from Portraits and Inscriptions

Zhang Shuzeng Gao Erwang

**Abstract:** The idea that “benefiting the offspring” was beneficial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was prevalent in the vast area and all strata of the Han Dynasty, which was vividly reflected in the inscriptions in propitious language on various objects such as picture bricks, picture stones, bronze mirrors, tiles, hooks and silk fabrics. The thought of benefiting the offspring was not only the manifestation of good wishes, but also the value concept generally accepted by the Han Dynasty people. The emergence of “benefiting the offspring”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Han Dynasty, such as family structure, soul belief, systems to become officials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nefit future generations, the people in the Han Dynasty achieved this goal through various behaviors such as sacrifice, burial, tomb selection, and exorc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eading valu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filial piety advocated by the Han Dynasty is not completely unified with the popular thought of “benefiting the offspring”, and there is still some deviation between the state system and folk customs.

**Key words:** Han Dynasty; thought of benefiting the offspring; inscriptions

责任编辑:何 参